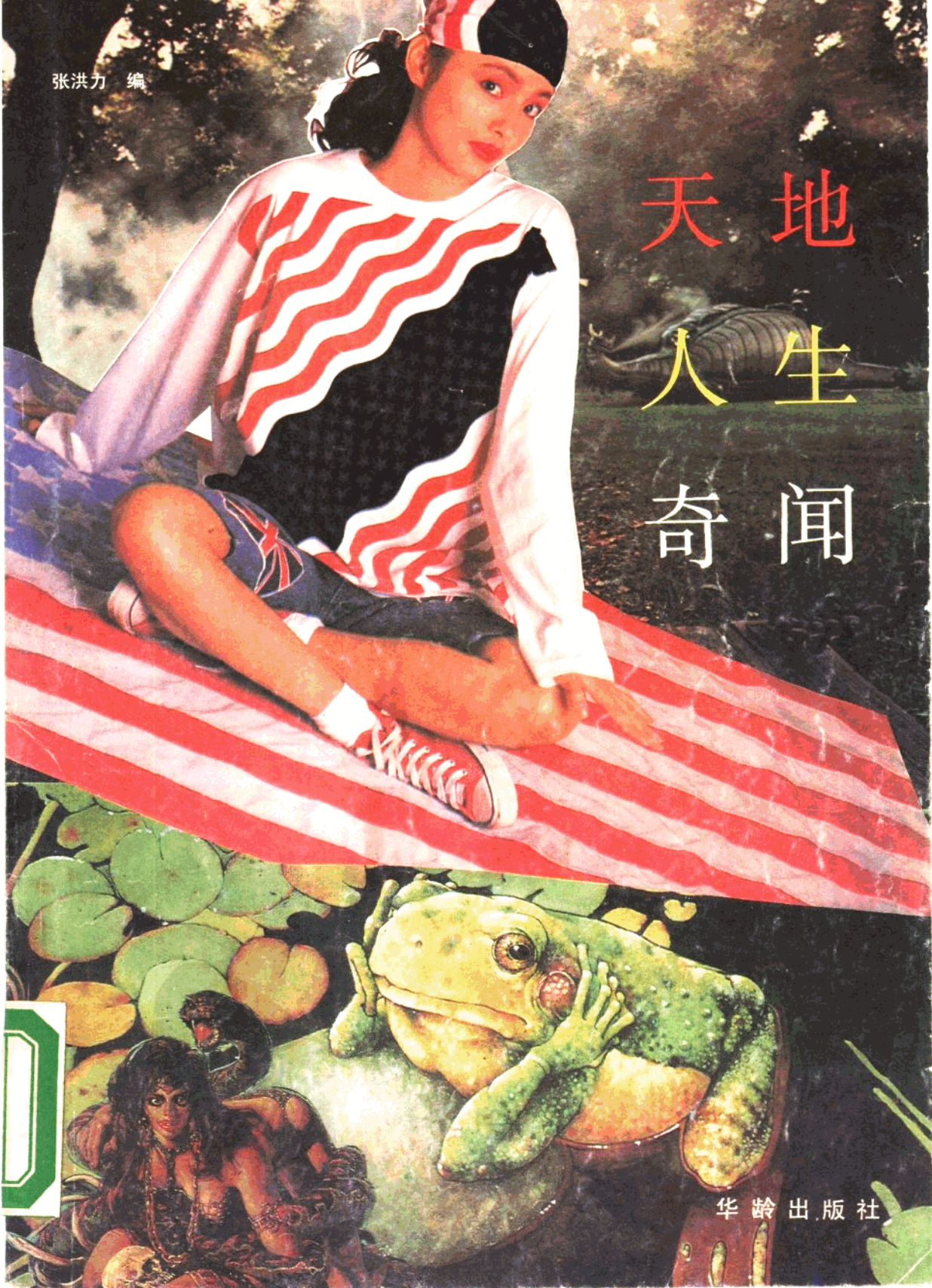


张洪力 编

天地 人生 奇闻



华龄出版社

目 录

名人轶事

马克思焚诗改志	(1)
毛泽东眼里的蒋介石和蒋介石眼里的毛泽东	(1)
一生坎坷的潘汉年	(2)
瞿秋白被捕的真相	(4)
叶挺与李秀文	(9)
善良的后母王光美	(9)
蒋介石曾想软禁毛泽东	(10)
一起谋杀彭德怀未遂案	(10)
夏公献画	(11)
林语堂烧婚书	(11)
刘亚楼的苏联亲戚们	(12)
杜月笙“劫持”宋美龄的内幕	(12)
蒋介石侍从室的中共党员	(13)
布哈林夫人回忆布哈林	(14)
勃列日涅夫的“刁蛮公主”	(17)
斯大林的替身	(19)
马科斯“藏宝”	(20)
名人趣事	(22)
戴高乐与安妮的父女情	(23)
赫鲁晓夫退休生活揭秘	(23)
起运拿破仑的棺木	(25)
世界十大女杰	(26)
六十年代我国影坛 22 位明星的行踪	(28)
靳羽西喜结连理	(29)
今日朱明瑛	(30)
陈冲在美国	(30)
秀兰·邓波儿智斗色狼	(32)

人到老年

饮茶与长寿	(33)
“老糊涂”可防可治	(35)

跪拜健身运动	(37)
老中医张赞臣健身四术	(37)
音乐的治疗作用	(38)
白芷能治尿失禁	(39)
哪些人不可大笑	(39)
康熙的养生经	(39)
秃顶者的四大优势	(40)
消除大脑疲劳十法	(41)
怎样才能愉快地早起	(42)
处理好老年夫妻关系	(43)
不要让“衰老”掩盖了病情	(45)

生活艺术

幸存者的秘诀	(46)
交谈的最佳距离和角度	(47)
战胜忧虑情绪	(48)
一吐为快	(49)
初次见面	(50)
怎样对待以貌取人的偏见	(51)
如何做一名出色的听众	(52)
不可缺少的道歉艺术	(53)
自己的路自己走	(54)
成功的秘诀	(55)
你在四十岁以前	(57)
男子汉自立度测验十五题	(57)
笑的妙用	(58)
男女交融的技巧	(58)
心与心	(59)
手指秘语	(60)
你具有哪一类兽性	(62)
不要追求完美	(62)

婚恋家庭

爱是人的专利	(64)
生命的创造与爱的升华	(66)
谈婚后矛盾	(68)

夫妻关系裂缝时.....	(69)
三个离婚的故事.....	(71)
做一个勇敢的求爱者.....	(72)
家庭和睦经验谈.....	(73)
八种性格类型婚姻易失败.....	(74)
婚外恋的信号及其预防.....	(75)
微妙的恋爱信息.....	(76)
男子如何摆脱失恋的痛苦.....	(78)
男子汉,你了解女人吗.....	(79)
妻子们最忌讳什么.....	(79)
丈夫为何离家出走.....	(80)
择偶标准的般配原则.....	(81)
如何避免性侵害.....	(82)
夫妻两地分居心态.....	(83)
古代择婿佳话.....	(84)
风靡美国的办公室爱情.....	(86)

万花筒

戈雷岛的奴隶堡.....	(90)
希腊破获“杀人公司”.....	(90)
囚犯替身.....	(91)
扒手国王.....	(92)
玫瑰花悬案.....	(92)
当今的“母系社会”.....	(92)
国外的“男人节”.....	(93)
亚当和夏娃的新发现.....	(93)
梦中解难题.....	(95)
代客奇趣录.....	(96)
2000年狂想曲.....	(97)
奥林匹克旗帜上的阴影.....	(98)
赛场上的阴阳人.....	(99)
国王的体育.....	(100)
篮球超级球星.....	(101)
八旬太后驾飞车.....	(101)
两次死而复活的实例.....	(101)
推迟了四十年的婚礼.....	(101)

重量会变的怪石	(102)
怪报拾零	(102)
“马拉松族”	(103)
一睡不醒	(103)
仅次于上帝的人	(103)
印度小新娘小新郎	(104)
洋和尚	(105)
奇异的“辟谷”	(105)
少林和尚的生活	(106)
《三字经》的最早外文译本	(108)
数的趣闻	(109)
姑娘貌美受惩处	(111)
澳一男子投身狮口	(112)
四只手的奇人	(112)
兽孩	(112)
穿墙奇人	(115)
燕子临难 螳螂御敌	(115)
飞蛾撞巨轮	(116)
猴子和人类	(116)
人蟒恩怨	(117)
老狗托孤	(118)
已知天高地厚	(118)
海底村庄	(118)
三十年冻尸复活	(119)
热气腾腾的冰岛	(119)
超级电脑杀死国际象棋冠军	(120)
“男子汉”音乐大师死后方知是女郎	(120)
烧钞票取暖的银行	(121)
抛侏儒大赛	(121)
人脑植进猩猩头	(121)
生命在于文明	(122)
冰箱救书	(122)
人兽相亲	(122)
双胞胎城	(123)
出生八天喊妈妈	(123)
蛙婴	(124)

双头女为坠胎双上法庭	(124)
幼童误食避孕药男孩变成女孩	(125)
英国一男子与莨苳草结婚	(125)
因祸得福	(125)
生儿酷似美人鱼	(125)
百龄孕妇	(127)
近亲结婚生蛇孩	(127)
奇特的嗅风人	(127)
后记	(128)

名人轶事

马克思焚诗改志

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卡尔·马克思，几乎花了毕生的心血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发现和揭露了资本赖以生存的奥秘，从而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了一场革命。但是，马克思早年的志趣却不在于此，而在于文学，尤其是写诗。

马克思在学生时代，便有广泛的爱好，并显露出多方面的才华。他在念中学时，特别重视语文课。由于他想象力丰富，阅读的东西甚多，加之语法知识掌握得好，所以他的作文相当生动，深受老师们的赞赏。

十七岁那一年，他考进了波恩大学，攻读法律。进入大学的门槛，使他置身于一个无垠的知识海洋之中，他几乎断绝了从前的一切交往，“专心致志于科学和艺术”。他除了阅读法学课程之外，还选修了文学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课程，希腊和罗马神话、荷马的史诗。他潜心研究文学艺术，怀着强烈的创作欲望，准备在这方面施展自己的才干。他开始翻译古罗马诗人的作品，使自己在这方面得到了锻炼。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写诗，既有讽刺诗，也有叙事诗，而更多的则是抒情诗，抒发自己对亲人的思念。

当时，马克思和燕妮正处于热恋之中，因此他便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感情。他曾在诗中写道：“世界上唯有你呀 / 是我灵感的源泉 / 快慰之神，希望之光 / 照耀着我心灵之窗”。诗的感情是真挚的，但艺术上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马克思善于解剖自己。他觉得文学应当接近实际，而不应当漫无边际地遐想，玩弄辞藻不能代替诗意相象，形式主义既没有鼓舞人心的东西，也没有振奋人心的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或许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的艺术同我的爱情一样都变成了某种非常遥远的彼岸的东西……”

作诗，并不是马克思的所长。他看到了这一点，毅然把存留在自己身边的诗稿付之一炬，并且从不后悔。从此之后，马克思便集中精力，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领域里刻苦耕耘，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学说。

毛泽东眼里的蒋介石和

蒋介石眼里的毛泽东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那本有名的《领袖们》一书中，回忆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谈到蒋介石时，毛泽东曾用轻松的口吻称呼蒋介石为“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毛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尼克松认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态度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

佩蒋介石。

在最近出版的《不可征服的人们》这本书里，英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讲了这么个故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从西安返回南京，他曾对他的部下开玩笑半当真地说：“如果我因为生病或因为别的什么不幸而下野的话，你们猜我会提名由谁来接任我？”

他的部下和朋友们纷纷提出各自认为最有可能的人选，多数人提到了程潜，还有人提到了汪精卫、孔祥熙以及其他国民党元老，但这些人都会被蒋介石否定了，蒋告诉大家：“我要选择的是——白崇禧将军！”

“第二人选呢？”蒋又问，大家又提了一些人，仍然没有猜对。“第二人选”，蒋介石平静地说：“我要提毛泽东！”

一生坎坷的潘汉年

潘汉年同志的一生，被蒙上神秘的色彩，是一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

但，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于1955年4月3日突遭秘密逮捕。昨天还是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常务副市长，为刚落成的中苏友好大厦剪了彩，转眼忽然成为“潘汉年、杨凡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并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等吓人罪名。到了1958年7月1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忽然发表社论，又把潘汉年与胡风捆在一起。

更令人费解的是，后来又传出潘汉年与“高、饶反党联盟”有关系。但潘汉年到底犯了什么罪？谁也不了解，谁也不敢问。从此，这个全上海家喻户晓的名字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的生与死。1977年，他默默地病死湖南的时候，妻子为他立的墓碑上也还是不能镌刻上潘汉年的名字。1982年8月，中央宣布给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人们才略知这是一起大冤案，但对他的许多功绩，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多了，更何况他的革命工作长期处在极其复杂的时代和极端秘密的环境中。他自己又严守纪律、不自居功，极为谦虚，很少也不容许与人道及，因而他那不平凡的一生，当年就很少为党内外所了解。因此，我的心境很不平衡，总觉得要写一些什么来安慰这位中华民族的精英。

“走上新路”之前

1906年1月18日，潘汉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县陆平（陆林）村。祖父潘理卿是清嘉庆年间的举人，父亲潘莘臣，清光绪年间的秀才。虽然世代书香，但因不去做官，只在家里务农、做塾师，所谓“耕读传家”，自然成为破落户。但父亲潘莘臣显然不是三家村的老冬烘，思想毫不保守，1911年辛亥革命后曾被选为宜兴县议员。后来年仅19岁的潘汉年在上海入了党，回到家乡传播革命火种，潘汉年的哥哥在大革命时在陆平为首成立农民协会，搞宜兴农民暴动，潘莘臣都是积极支持。当时，仅陆平一村中共党员就有十几个，而潘家除潘汉年兄弟外，尚有堂兄潘祥年也是大革命时期宜兴暴动的领导之一。从中可以看出这位陆平老塾师的政治态度。1928年潘莘臣病逝，临终遗言是：“汉儿等走上新路，吾心甚慰，务必谨慎从事。”由此可见，潘汉年有一个不同凡响的父亲。

在兄弟中，潘汉年排行第三（因此他后来曾用过“水番三郎”这一笔名），从小聪明过人，为长辈所钟爱。民国初年，他就读于宜兴官林的霞霞学堂。1919年夏，考入和桥的彭城中学堂，后因病辍学，协助父亲创办陆平等小学堂。病愈之后，1921年进武进延陵公学学习。此时的他，爱好文学、外语，特别是戏剧，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就自编自演反映民生疾苦的戏剧。他扮演过贫苦人民反抗恶势力的角色，使观众为之动容。后来终因家贫，只得离校去宜兴励进社小学任教，在那里他团结了一批进步教师，反对县教育局局长重用的土豪劣绅把持教育界，批评反动人士的不良行为，因此被

宜兴县政府非法拘捕，关押牢中，后经其父聘请律师出面辩护，方始恢复自由。1924年，他又到和桥镇任养初小学教员，宣传进步思想。为了打下扎实的国学根柢，这年秋天他还进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这时，大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深入青年学生心中，潘汉年终于不能满足于对中国古文的研究，又拿起笔来创作语体诗。

革命形势激荡，大变革近在眼前。敏感的潘汉年不能再安心地留在思想闭塞的乡镇当小学教员了，他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间去驰骋。1925年初，他离开故乡，进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从此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创造社的小伙计

十九岁的潘汉年来到大上海以前，已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诗《不敢》、杂文《可怕的路人》、《武人的枪》等作品，他的文名已被上海文化界所注目。1925年初抵沪后，他即被聘为上海中华局《小朋友》杂志的编辑。在投入文化工作的同时，他又迅速投身于使热血青年沸腾的政治洪流之中。

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开始，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潘汉年也参加了革命的国民党。

“五卅”运动中，潘汉年置身于愤怒的示威行列，写出了热情洋溢的檄文。运动中，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这以后，他发表于《语丝》的《苦哇鸟的故事》，说明他的思想已体现革命者的自觉。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朱镜我等人发现了这个后生，邀请他参加创造社，并请他主编创造社的《A11》周刊，该刊迅速出版，发刊词和第一期编后记就出自潘汉年之手。

说起这个《A11》周刊得名的由来，还有一段值得纪念的情节。原来，上海闸北宝山路上有个“三德里”，“五卅”运动以后不久，创造社在三德里租了A11号作门市部兼编辑部，在这个机关里有几个小伙计；他们是：周全平、柯仲平、叶灵凤、潘汉年、周毓英和邱韵铎等人。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既管编辑，也管门市部的买卖。校对、捆书、打包、跑邮局、招呼客人，什么都干，“小伙计”由此得名。

后来，潘汉年又和叶灵凤合伙办了个小小的半月刊《幻洲》，这本46开本的刊物分两部分，上半部叫“象牙之塔”，登文艺作品，叶灵凤负责编辑；下半部叫“十字街头”，潘汉年主编，专刊杂文。潘与叶二人合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一家皮鞋店楼上，这里既是宿舍，又是《幻洲》编辑部。霞飞路当时已相当热闹，所以他们住处的窗外车声不绝于耳，因此，潘汉年戏称这个房间叫“听车楼”。于是有些文章就以“听车楼主”的笔名发表。说起笔名，除前面提到过的“水番三郎”外，我们知道的就有“泼皮”、“严灵”、“汗牛”等五六个。那么，他何以不断更换笔名呢？除了斗争的需要外，还因为他的多产。有时，半部《幻洲》的杂文他一个人包了。他擅长讽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骂吴稚晖、骂左舜生、攻胡适，骂得痛快、攻得犀利，大家爱看。他又自称“新流氓主义”，表示硬是和“正人君子”过不去。潘汉年的杂文一扫当时无聊文人的颓废气氛，反对“为文学而文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留下深刻的影响。

由于以后潘汉年主要从事在特定环境下严酷的政治斗争，文学创作已无暇顾及，除以后在1928年还出过一本名为《离婚》的小说集以外，没有其它单行本问世。应该承认，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大，但他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时期代表党对左翼文化界的领导却成绩卓著，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是，现代文学史著述中往往无视潘汉年的辉煌功绩。

“小开”主持“文委”

1926年底，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的范围为国民党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及江西的地方工作）的郭沫若，曾邀请潘汉年去南昌担任《革命军日报》总编

辑，兼政治部宣传科长。《革命军日报》是一份军队报纸，潘汉年接手后，办得严肃而富有生气。半年后，蒋介石叛变革命，潘汉年奉命率领部分同志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

经过这大半年革命斗争的洗礼，潘汉年重返沪上时已相当成熟了。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在南昌时就相当欣赏潘的才华，决定由他担任上海文化工作党团干事会的书记（这年冬天，这个组织改属党中央宣传部领导。1928年，在中宣部下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他出任书记）。他的任务是把上海的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反对国民党及其它反动党派的“文化围剿”，与此同时，也要解决左翼文化人内部的教条主义、关门主义倾向。潘汉年不愧是组织工作的干才，当时上海的文化界何等复杂，他自己二十刚过，在文化人中最多是小有名气，但就是他，依靠党的威望，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缜密安排，忘我工作，短短一二年内，“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乃至“剧联”等组织，相继成立，开展活动。他作为“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央党组书记统一领导这些社团，俨然帅才。后来，这些组织还发展到天津、北京、广州、成都等地。在艰难的岁月中，能够组织起这样多的革命文化团体，实在是惊人的创举。

大革命前，他只是个初露头角的小伙计，此时，他已能自如地周旋于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之间，自信地开展工作了。由于工作需要，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不知哪个人给他取了个“小开”的代号，此后，同志们当面和背后，都称他“小开”，年青的“小开”，领导人财荃萃的上海左翼文化界，开创三十年代初上海滩进步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这段历史实在很值得回味。

潘汉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他还是能腾出手来和叶灵凤合编《现代小说》月刊，他还经由现代书局、联合书店出版、重版了郭沫若的许多著作。用现代的话说，叫做“双肩挑”。其时，他还没有扔掉做文化工作的本行。

1930年2月，潘汉年发起和主持“中国反帝自由大同盟”，鲁迅也作为这一统一战线组织的发起人参加工作。这一年3月2日，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必须强调的是，鲁迅对于潘汉年曾不无误解，把他看成是“唇红齿白”的“洋场恶少”。站在创造社的立场，潘也曾感到鲁迅不无偏激，但是他首先打破门户之见。他深入地做了创造社、太阳社朋友的工作，引导他们尊重鲁迅，与原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合作，又与鲁迅交谈，取得鲁迅的充分信任，这才使“左联”的成立成为可能。因此，“左联”在北四川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成立的时候，潘汉年代表党中央发言，而后鲁迅发表了他那著名的讲话，大家相继致词，气氛极为融洽，这是和潘汉年在会前的大量工作（也包括冯雪峰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文学史家也许会对潘汉年在“左联”成立后刊载在《拓荒者》上的《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对三十年代文艺界所曾产生的重大影响感兴趣，因为她是如此深刻地切中当时文艺界的弊端，如此精辟地论述了“左联”的任务。文学史家一定会叹服潘汉年在《文艺通讯》一文中关于题材问题的独到见解。

但时隔五六十年，我们已很难对潘汉年当年大量的文学活动、杰出的左翼文化社团组织工作（他还担负“保卫自由反帝大同盟”和“国际互济会”方面的工作）和无畏的对敌斗争作出全面的描述了。好在潘汉年同志沉冤得雪，今后的史家在撰写三十年代文化史时，想来再也不会无视他的历史功绩了吧。

瞿秋白被捕的真相

浙江新昌县城郊的两间平屋里，住着一位82岁的老人，日常只有一个老年保姆和几个母鸡陪伴着。门前冷落，默默无闻。

这位老人名叫周月林，53年前，她曾与瞿秋白一起被捕，但幸免于难。解放后她曾被疑为出卖瞿秋白的“两个女人”之一，而含冤几十年。197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她彻底平反，宣告无

罪。但直到前不久，还有一些文艺作品和研究文章仍袭用旧的说法：“两个女人出卖了瞿秋白”。事实究竟如何？我数次前往新昌县，访问了这位老人。老人有根有据，如泣如诉的回忆，解开了我的上述疑问，同时留给我许许多多有益的思考：

闪光的青春

我祖籍宁波，1906年出生于上海，家庭贫寒，没上过几年学。19岁那年，上海发生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暴行，非常愤激，就和工人、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散发传单，宣传鼓动群众。不久就由张琴秋介绍入党，我的胆子很大，敢一个人深夜到工友们家里去，因而得到地下党组织的信任，委任我当曹家渡部委妇女部负责人。那时白色恐怖严重，为了工作便利，我还和总工会主席汪寿华结为假夫妻。

1926年秋，敌人已经侦查出了我的真实身份和行踪，好几次面临被捕的危险。我在上海已无法再呆下去，党组织便派我到苏联学习。到海参崴下船，被当地的中共组织安排到党校学习。当时，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的浙江新昌人梁柏台是远东华工组织的负责人和中国党支部书记，在党校兼教政治课。我和梁柏台从相熟到相爱，于1927年夏结为革命伴侣。婚后生了一女一男，女儿取名伊斯拉，俄语即“火星”的意思；儿子取名弗宁，即“弗拉基米尔·列宁”中的头尾两个音。表示了我们对于社会主义苏联的热爱。当时，任弼时、叶剑英、刘伯承、刘伯坚、萧劲光等同志都来过我们家里，或找梁柏台联系工作，或来申门做客。他们见面都亲热地称呼我的俄文名字“卢文斯卡娅”，我从他们的行为风范里学到了不少东西。

1931年，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正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政府，制定各种法律，人才奇缺，我和梁柏台双双要求回国。很快就得到了批准。国际东方部明确告诉我们：你们是回国干革命的，带着孩子是个累赘。把孩子送到国际幼儿园，你们放心地回国去吧。离别那天，我还是忍不住哭了。两个孩子拉着小手不停地说：“妈妈再见！”回国后我的生活不断遭受变故；他们姐弟俩生活的苏联，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和多次政治运动，他们不知是否还活在人间。几十年来，我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他们。如健在，现在都已有五六十岁了。

回到中央苏区，梁柏台立即投身到起草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红色法律的工作中，我也象其他的红军女战士一样，精神抖擞地学习做各项工作。

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同志发现我工作泼辣，侃侃而谈，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郑重地推荐我担任中央妇女部长，那时中央正好缺妇女部长，张闻天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成。

在中央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取得了胜利，俘虏了许多国民党的军医，苏维埃政府打算以这些人作为医务骨干成立一个国家医院。毛主席就托梁柏台捎信来邀请我去当院长。于是我离开了中央机关当了国家医院的院长。

在沙洲坝，我们和主席两家住在同一所小院里，每天见面。毛主席平时和蔼可亲，谈吐风趣幽默，常跟我开玩笑说：“月林，你怎么看见年轻的小伙子就笑咪咪的，看见我老头子就不吭声了？”其实他那时才三十四五岁。毛主席习惯夜里读书、工作，白天睡觉，极喜欢读《水浒》、《三国演义》之类古典小说，与常人不同的是，毛主席的手特别大，十指如柱；嗓门特别响，如钟鸣一般。

命运的大潮

1934年秋，第五次反围剿的仗越打越糟，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悄悄地做着撤离苏区的准备工作。又听说要留下一部分力量坚持斗争。一天，毛主席从中央机关开会回来，我赶过去问他：“我走不走？”“走，你和梁柏台都要走！”毛主席语气很肯定地回答我，既然要走，我就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样，把我到了中央苏区以后生的一个女儿送给了老乡。我这可怜的女儿后来和抚养他的老乡一起被国

民党抓去不幸病死于狱中。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编成野战军，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就在这时，梁柏台回家来告诉我，他不走了。原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提名要梁柏台留下来协助他搞政府工作。梁柏台不走，我也只好留下了。

红军的主力全走了，留下来的几支弱小部队和地方游击队，怎么顶得住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很快，红都瑞金失陷，苏区根本无法立足了。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保存有生力量，将中央分局、政府办事处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各部队，分路突出重围。分局决定将我和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最高法院主席何叔衡、项英的妻子张亮4人组成一个小组，目标是经福建、广东去香港或上海做地下工作。与我们同行的还有邓子恢，他是奉命到福建永定、龙岩一带去发动游击战争的。5人中瞿秋白患有严重的肺病，何叔衡年老体弱，张亮已有五六个月的身孕，只是邓子恢和我比较年轻体健。邓子恢是打游击出身，我们还在安全方面对他有所倚重。

这四个人我都相识。瞿秋白早在莫斯科中大时我就认识他了，1934年2月他从上海来中央苏区后，我们又经常碰面。他的肺病已到了晚期，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浮肿，显得十分虚弱。他这次突围还有到上海去治疗肺病的目的，何叔衡是中央领导中的年长者。曾经认我做他的干女儿。张亮原是四川一个军阀的小老婆，后逃至上海做工，与在上海搞工人运动的项英相识结婚。我们也是在中央苏区熟悉的。

5人汇齐后，就急忙向福建方向进发。两天后，按原计划到了福建省委驻地汀江四都山上，省委书记万永诚已接分局通知在那里等候。万永诚的妻子负责安排我们食宿，从而了解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份。她不久以后被捕，供出了瞿秋白将从这里突围。万永诚叫我们乔装成被红军抓来的犯人，每人都戴上一只面罩，由福建省委派了一连战士，“押送”我们向永定方向进发。

我们往闽西方向急急地走了三天，到了上杭县的水口镇附近。这一带驻扎着蒋介石的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汀江横亘在水口镇的北面，一座木桥是唯一的通道，敌人岗哨林立，来往军人络绎不绝，根本就别想白天从桥上过去，只有利用夜色掩护从下游偷渡。护送队战士迅速扎了一担架，准备抬瞿秋白和何叔衡过河，但到了过河时，张亮怕水冷，不肯过河，非得等担架来抬她。这样一副担架来回过了三趟河，耽误了许多时间。等大家都渡过河后，天已拂晓了。过了河就完全是国民党区域，白天不能行动，我们走了没多少路程，天就放亮了，只好复往附近的小径村休息隐蔽。

刚刚坐下，村口就响起了枪声，哨兵来报：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护送队的连长一面调动战士阻击敌人，一面催促邓子恢赶快带领大家从村后山上突出去。当我们爬上后山，大股的国民党军已突破护送队战士的防线，向后山涌来。而后山却陡峭难走，情况危急，战士们叫我们赶快滚下山去。邓子恢和他们几个男的先滚，我手抱脑袋，眼睛一闭也滚了下去。一会儿到了山下，看见了邓子恢在前面，我顾不上浑身疼痛就追着追了上去。翻过几道山梁以后，我才发现瞿秋白、何叔衡和张亮不见了。于是我跟邓子恢打了一声招呼，就返回寻找他们。

我一边往回赶一边四处寻打，翻过一道山梁，看到山脚下有个人艰难地向上攀登着。走近一看，我喜不自禁，正是瞿秋白同志。我搀扶着瞿秋白慢慢走了一段路，听到后头有人呼唤，回头一看，原来是张亮赶上了，我问：何老呢？她说一开始还和她走在一起，后来被一股敌人冲散了，过了一会儿，她听不到远处响起一阵枪声。何老就是在这时被几个国民党士兵追逼到一丘水稻田里枪杀的。

我们伏在草丛中监视着附近的动静，远远的看到有一股国民党保安团士兵朝这里搜查过来。瞿秋白大约是病体虚弱的缘故，立脚不稳，一跤摔倒了。他这一跤不要紧，却撞在了一棵小树干上，树枝摇动，引来了那股敌人。

大约一个班的保安团士兵，他们一边弯腰向我们合围过来，一边说：“里面肯定有人，要不别的树都没动，怎么光这一棵树在摇？”到了我们藏身的地方，他们一字儿散开，为首的一个大声吆喝：“里面有人快出来！”我们三人都没吭声。那个家伙又大叫了一声：“再不出来我们就开枪啦！”他把手一挥，就

听到哗啦啦的拉枪机声。大约静默了半分钟，万没想到这时张亮沉不住气了，带着哭腔说：“不要开枪，有人！”说着站了起来，我惊呆了，但伏在原地没动，瞿秋白也没动。张亮走出了草丛，保安团士兵们立即围过来，搜了她的身，抢起了她身上带的钱物，而后问她：“里面还有人吗？”张亮不回答，但也不走开，不停地顾盼我们藏身的草丛。敌人起了疑心，为首的那个叫了一声：“搜！”我和瞿秋白就这样被俘了，被捕后，敌人把我们押往水口镇，关在营部。第二天，敌营长对我们进行了审讯。我们按编造的口供内容回答，敌人没有问出什么来。随后，敌人把我们三人和20多个护送队战士一起押到了上杭县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十四团团部，瞿秋白与那20多个护送队战士关押在一起，自此，我再也没见过瞿秋白。

事有凑巧，敌营长李玉伯母的侄媳妇快要生孩子，而当地没有接生婆。她听说我是护士，会接生、打针，就出面把我保了出去，住到她的家里。

没过几天，我听说张亮也被保释出去了。保释她的是上杭县城一家的糖果店的老板，他为没有子嗣，看上了张亮肚子里的孩子。我马上赶到这家糖果店找到了张亮，要求她先不要走，等保出瞿秋白以后一起走。没想到张亮对我说：“瞿秋白没法保了，他已经被解押到长汀了。”长汀是宋希濂36师师部所在地，敌人为什么单单将瞿秋白一个人解送到长汀去呢？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很可能已经暴露了。既然保释瞿秋白已经没有希望，我们留在这里也十分危险，我建议张亮跟我一起马上走掉，但张亮已经临近分娩了，无法行动，她想等生了孩子再走。就在我们犹疑之际，两天后，保安十四团又将我和张亮重新收监了。

大约一个月以后，敌人又派兵把我押到了龙岩。一到龙岩就对我进行审讯，我仍以原来的口供作答。主审官冷笑了两声，随即叫进了两个男人。我一看，他俩都是原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干部，跟我很熟悉，一个名叫杨岳彬，另一个名叫朱森。他俩一五一十地供出了我的真实姓名和担任的职务，还告诉敌人我是梁柏台的妻子，曾去苏联念过书。敌主审官得意地把一张报纸仍给我看，说：“周月林，你不必再演戏了，瞿秋白已在36师也承认了。”我拿过报纸一看，上面确实登着瞿秋白在给36师军官写字刻画章的消息，我此时才确信瞿秋白自己暴露身份了，但到底是谁出卖了他呢？

后来经查明，是一个名叫郑大鹏的叛徒指认了瞿秋白。在这之前接待过我们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王永城的妻子被捕，已先招供了我们一行人的行踪，因此敌人判定瞿秋白就在被捕者当中。

敌人搞清了我的真实身份以后，就设法套、逼我的口供，想从我的口里获得一些我党和红军的机密情况，我抱定决心要宁死不屈、忠于党和革命事业。敌人失望了，最后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将我判了10年徒刑，投入龙岩监狱里的一间黑牢房。

敌人的黑牢，潮湿肮脏，终日不见一丝阳光，只有星期天几分钟的放风时间里才能到外面透口气，伙食糟的不能再糟，看守凶得吓人，但我始终心里装着党，未向敌人吐露自己知道的革命机密。许多纪念瞿秋白的文章里讲到，瞿秋白被捕后，坚不吐实，他所知道的从广东、福建经香港去上海的我党秘密交通线，一直使用到抗战前夕而未遭敌人破坏。其实这条交通线我也清楚，敌人也从未从我这儿得到过什么。

在龙岩狱中，张亮经我的接生产下了一个男孩，我帮她艰难地抚养着这个孩子。

好不容易过了三年。1938年5月的一天，典狱长对我们说：“周月林、张亮，外面有人保释你们，你们办个手续，就可以出狱了。”

我们既惊喜又极感意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匆匆办过了手续，就到城里的一个小店住下。这时才了解到，保释我们的原来是梁柏台老家的一个亲戚，名叫陈士明，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任要职。一次酒宴上听一个司法界要人讲起龙岩关押着两个女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就是梁柏台的妻子。于是他就去找了蒋鼎文部的一个军法处长，也是新昌人，请他帮忙疏通。有这样显赫的人物出面，兼之当时国共合作抗战，政治气候相当宽松，监狱当局就让我们保释出狱了。这位好心的亲戚，直到前两年才在家乡逝世。

出狱该去哪里？党组织一时又联系不上。我和张亮带着她已四岁的儿子，来到了梁柏台的老家——浙江新昌县查林村，没想到我们到了梁家一打听，他们也不知道梁柏台在哪里。梁母思儿不得，现在看到媳妇领着“孙子”回来，倒也十分欢喜。我因没打听到梁柏台的下落，心里凉了半截，决意到外面去寻找党组织。8月间，我把去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想法告诉了张亮，她说她要投靠亲戚，我也没有勉强她；从此后她和那个男孩就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了。

我只身来到武汉，但没有找到叶剑英，只好走了最后一条路——回上海我的娘家去。

回上海不久，我从一张国民党旧报纸上看到，日夜挂牵的亲人梁柏台早在1935年4月就因率部队突围被俘而遭国民党杀害于江西大余县。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我曾经想弃苦难人世而去。当然生活还是挽留了我。为了吃饭，我得找一个生活依靠；而且，我毕竟才30出头，经人撮合，我把命运之舟系在了一个穷苦船工的床头。生活又把我改造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一日三餐，生儿育女，历尽波折，只祈求平静。

1949年，解放的曙光使我的心头为之一亮。然而命运的大潮硬是不让我平静。

新中国成立后，清查出了许多暗藏的特务和有血债的叛徒，但出卖瞿秋白同志的元凶却始终没有抓到。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于1955年向党中央提出要求逮捕出卖瞿秋白的凶犯，为九泉之下的烈士报仇。公安部迅速由专人负责立案，初步调查表明：与瞿秋白一起突围的5人中，邓子恢没有被捕，何叔衡当时即已牺牲，张亮解放后下落不明，唯一活着的当事人只有我一人，于是我成了唯一的嫌疑犯，1955年3月的一天傍晚，两个公安人员在居委会主任的带领下来到我家里，向我出示了逮捕证。这次被捕距上次被国民党逮捕正好20周年，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巧合。第二天即由专车直接押送北京公安部。

多次审讯没有结果，因为我每次都是据实回答。但是又不能轻易放了我，因为我是唯一的破案的活线索。于是最简单而又牢靠的办法就是关押——无限期的关押。

1965年，此案被重新抓起，尽管我从来没有承认过。12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瞿秋白”的罪名判了我12年徒刑。

最初的囚徒生活是在北京秦城监狱度过的。1970年，林彪的一号指令，我被疏散到了山西榆次市。我老了，心也死了，象一段枯木，没有希望，没有期待，只有苟延。

姗姗来迟的春光

和我们的民族一样，也是1978年那刮遍全国的春风给她带来了生机，周月林给我叙述了转变她的命运的那个契机。

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周月林作出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她自由了，她解放了，但是却无家可归。她只好仍然孤身留在榆次，苦度着凄凉的晚年。

1983年，新昌县党史办开始征集梁柏台烈士的材料，准备写他的传记。掌握材料最多的当然是烈士的妻子周月林。可是周月林在哪里呢？他们从《上海党史资料》看到早期党员徐大妹的一篇回忆，谈到在海参崴见到过周月林。从徐大妹到上海市公安局，再到公安部，终于在山西榆次市一间低矮的简易房子里，新昌县委党史办的两位同志找到了周月林。

这时的周月林，万没有想到这世上还会有人来看望她，她还可能会有用于这个世界。激动、喜悦、悲伤、感慨之情自不用提，新昌县委党史办的两位同志一道明来意，她就打开了关闭了几十年的记忆的闸门，滔滔不绝地回忆起来了。一年后，新昌县委党史办即写出了《梁柏台烈士传记》。

新昌人民为家乡出了梁柏台这样伟大的革命烈士而深感自豪，他们也非常关心和敬仰烈士的遗孀周月林。县委得知周月林的现状后，立即作出决定：邀请周月林来新昌定居。周月林老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她说：“我也是新昌人的媳妇嘛，梁柏台生前对家乡感情深厚，我到新昌定居，就等于回到烈士的身旁。”

讲到这里，周月林老人热泪盈眶。

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安慰她说：“周老，党不会忘记你！人民没有忘记你！新昌县人民欢迎你！”

叶挺与李秀文

一个春天的早晨，叶挺经同盟会会员李章达介绍，和李秀文交上了朋友。那时叶挺25岁，在孙中山身边担任警卫营长，李秀文是执信中学的高材生，两人相识之后便相互倾慕，情投意合。

1922年夏，陈炯明叛变，叶挺率警卫营掩护孙中山撤退后，冲出重围。夜晚，叶挺隐蔽于市郊一个农家。李秀文得知叶挺的下落，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叶挺身边，把她多年积存的一点贴己钱交给叶挺，作为她对伴侣的支持。

孙中山重回广州，叶挺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以后，便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团长，李秀文和叶挺在独立团驻地举行了婚礼。

而后，叶挺屡经征战，李秀文都与丈夫休戚与共，艰辛备尝。叶挺出走欧洲，李秀文万里迢迢去寻夫。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叶挺应共产党的邀请出任新四军军长。李秀文说服父亲，使父亲把全部养老金捐献出来，加上别的爱国华侨的资助，买了3600支短枪，200架望远镜，由李秀文押运，亲自送往新四军军部云岭。只因风云突变，秀文才与叶挺洒泪而别。

秀文走后，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叶挺被俘入狱，囚于上饶。李秀文委托副官杨文鼎带着衣物从香港赶到上饶，探望叶挺。叶挺抱定就义的决心，要杨文鼎转告秀文，以后不要再来看他。可是当叶挺被押解到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第二天，秀文和他8岁的爱女杨眉突然走进了他的囚室。秀文望着丈夫那难以辨认的披胸须发，不由的心如刀绞，泣不成声。那首彪炳史册的《囚歌》就是这时写的。当秀文把这《囚歌》以及叶挺用香烟纸盒里的纸片制作的小礼物送给郭沫若时，郭沫若感动得热泪纵横。

1946年春，共产党提出以国民党的被俘军长马法五换回叶挺。蒋介石被迫同意。当秀文得知叶挺获释的消息，立即赶赴重庆与叶挺会面。1946年4月8日下午，叶挺和李秀文乘机飞返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撞山坠毁，他们夫妇二人和女儿同时遇难。

善良的后母王光美

王光美对刘少奇前妻所生的孩子照顾得比自己亲生的还要周到。刘少奇娶过5次妻，其中3个妻子留下了9个孩子。他的第一个妻子何宝珍生有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两男一女；第二个妻子谢非没留下孩子；第三个妻子王前16岁时嫁给刘少奇，生下刘涛和刘允真一男一女；刘少奇的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后就分了手；第五个妻子是王光美，他们1948年结婚，婚后第二年生下刘平平，以后又生了刘源源、刘亭亭、刘小小（满满）。

王光美来到刘少奇这个儿女关系复杂的家庭时，何宝珍生的孩子年龄比较大，且又都在苏联上学，所以没有与后母发生过矛盾。王前留下的涛涛（刘涛的小名）和丁丁（刘允真的小名）都还不到5岁，非常需要温暖的母爱，后母的任何不周都会伤害他们幼小的的心灵。

王光美对涛涛、丁丁悉心照顾，视如亲骨肉，她没有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是异母兄弟姐妹。平平到了十几岁，还不知道涛涛和丁丁不是自己母亲所生，常为母亲平时特别亲涛涛而不高兴，有时还对自己的朋友们说：“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我夹在中间。妈妈最能欺负我，姐姐想要什么，马上就给，妹妹因为小，妈妈也宠着，只有我最倒霉，要什么都不给！”

对何宝珍留下的3个孩子，王光美也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刘允斌、刘爱琴从苏联回来时已经是成人，而且结了婚，有了家庭，父母没有必要再为他们操心。只有刘允若还年轻，婚姻问题尚没解决。王光美为给他找对象，费尽心机。一次，刘允若相中了电影《五朵金花》的女主角杨丽坤，王光美为此亲自去见了杨丽坤，杨没有答应。

王光美贤惠、热诚、脾气好，把刘少奇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搞得关系融洽，使家里充满和睦气氛。

蒋介石曾想软禁毛泽东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与毛泽东进行了几次交手之后，自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怕谈判结束后“放虎归山”。于是又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软禁毛泽东，但又怕此举失信于天下。正在举棋不定之际，他接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冯玉祥将军等人分别打来的电话。于、冯等人说：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外界竟有微词，谓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于和谈有碍。为正视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蒋介石听着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只得故作镇静地说：“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

后来，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又考虑到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伪装还不宜过早地撕破，只得打消了软禁毛泽东的念头。

一起谋杀彭德怀未遂案

1942年底，八路军前方总部的警卫员小王。深夜，他突然生了急病，高烧不退，在神智昏迷中用手枪自杀了。

总部保卫部杨奇清闻讯立即赶到警卫员的卧室，他仔细勘查了现场，发现浆洗好的衣服整整齐齐叠在床头，一只香荷包却被撕裂丢落在地。

杨奇清敏捷地感到这事蹊跷，难道高烧可以使人糊涂到开枪自杀吗？这个警卫员平常表现不错，他斗争坚决，对敌人恨得咬牙，对首长爱得深沉。杨奇清思索着，警卫员小王的自杀事出有因，关系重大，一定要彻底查清。

过了几天，那个女人在饭馆里与一个从外地来的阔少爷频频举杯，并递给他一本《古文观止》的时候，我公安人员把他俩双双逮捕了。

经过检验，那本《古文观止》正是国民党中统局特务的接头暗号，这个女特务受命潜入我八路军前方部驻地，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就在联欢的那天晚上，那个自称小王表姐的女人同警卫员小王拉扯了一阵之后，突然提出要他去谋杀彭总，警卫员坚决不答应，并气愤地指责她心肠歹毒，要去报告保卫部。那女人此刻原形毕露，变脸说：“你去报告，俺就说俺俩有关系。”

小王急了，他虽然还没同她发生不正当关系，但与她确是订过情呀，他气得直咬牙，把那个香荷包撕碎了，而去抢她的银戒指时，她溜了。甩下了一句话：“你不杀了他，人家要你的命。”

小王年轻，他的思想包袱太重，终于导致了开枪自杀。

夏公献画

1989年10月12日，文坛宿将夏衍在他90岁生日前夕，将自己多年收藏的94件珍贵的书画作品捐献给故乡人民。

那天，浙江博物馆汪济英、李幼强同志带着故乡人民对夏公的敬意和问候，来到北京这座静静的四合院。

90高龄的夏公见到故乡来人显得特别高兴。他说：“我不是收藏家，只是爱好而已，过去有点钱就陆续买一点，现在年纪大了，还是交给国家收藏为好。”

一个月前，夏衍曾致函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个心愿：“我收藏的扬州八怪、齐白石及吴昌硕等人的作品不算多，但也有一些精品，生前不处理掉，作为‘遗产’，就会引起麻烦，所以还请您和浙江博物馆联系一下，请他们在国庆后和我商定交接办法。”

夏公让女儿沈宁把作品交给浙江博物馆的同志清点造册，他向来客介绍自己收藏作品的一些情况。他说：“我收藏的主要是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作品。‘扬州八怪’的作品有创造性，并不怪，我认为还是叫‘扬州八怪’好。”

夏衍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时，与北京博古斋等书店的主人很熟，主人知道夏衍爱好收藏，每有精品就告诉他。夏衍知道文物之珍贵，不惜代价，陆续购买收藏了一些。现在这些作品已成无价之宝，海内外不少收藏家为得到一件“扬州八怪”的作品绞尽脑汁。夏公这次捐献的“扬州八怪”的作品竟达34件，而且极为难得的是八家的作品皆有。

看到齐白石大师的25件书画佳作，夏衍又忆起了往事。这些书画都是白石老人在世时，夏公购买的。白石老人有个怪脾气，喜欢新钞票，夏公上白石老人家购画，总是带着崭新挺刮的钞票，当场交给老人。

客人在赞叹夏公收藏之丰时，夏公惋惜地说：“‘文革’时我的书画全被抄去，其中郑板桥和齐白石知道的人最多，所以这两人的作品散失也最多。”后来这些作品虽然几经辗转退回原主，但已遗失了三分之一。

其实在“文革”之前，康生一伙早就开始了窃取书画的勾当。夏公讲了这么几件事：“文革”以前，夏公有件高凤翰（有的史家把他也列为“扬州八怪”之一）的作品，康生得知后向夏公“借”，说是看看这位山东同乡的杰作，结果这件作品有去无回。还有海内罕见的清初大词家纳兰性德的诗翰手卷，“文革”中被陈伯达拿去，后来不知怎么到了林彪手里。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家湾展出他的收藏品，手卷才完璧归赵。现在，夏公已将这件弥足珍贵的文物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

如此慷慨捐献国家的夏公，一再声明：一不要奖金，二不要奖状。只有一个小小要求：希望在收藏过的作品上盖一方“仁和沈氏曾藏”印章。说罢，他叫女儿把藏印拿出来。这印章是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1976年去世前的绝作，原设计的印文是“仁和沈氏珍藏”，夏公请他将“珍”字改为“曾”字。这一字之改，显示了夏公的脑意情怀。

清点交接工作进行了一天。夏公认为做完了晚年应该办好的事，欣慰地笑了。

林语堂烧婚书

文学家、幽默大师林语堂说过“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怎样去驾驶它”。林语堂此话是颇有心得的。他是怎样欣赏和驾驶自己的婚姻之船的呢？